

无名论坛

# 在“知识流放”中吟唱

——孙越生和他的“干校诗”

李 辉

1

2

几年前,我在关于五七干校的一篇文章《旧梦重温时》中感慨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两大社会迁徙,但知青中走出了一个个作家,知青文学由此引人注目,而五七干校的生活,除了几本回忆录外,却几乎没有产生引起轰动的作品。一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历史变动,仿佛没有在那些当事者中激起多少浪花,仿佛一夜之间轰然而起的骚动,又在一夜之间趋于平静,趋于沉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譬如年龄、环境、心情等等,两代人会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仍然不能想像,千千万万“五七战士”,思想都已枯竭,情感都已苍白,面对“文化大革命”惨状,面对历史困惑,他们会死一般沉默。

当然不会。顾准的思想与人格重新引起关注,证明了在那段历史的场景中,一直有着坚毅的身影在闪亮。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值得今天人们敬重和研究的前辈知识分子中,孙越生无疑有着特殊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他对官僚政治的系统研究,他在干校期间偷偷创作的诗歌,在当代思想领域、在当代文学领域,都具有特殊的价值。

第一次知道孙越生的名字,是读了他的一篇杂文《蚯蚓现象》。1988年,他以这篇杂文获得《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举办的“风华杯杂文征文”一等奖。以蚯蚓的以首生身、以身生首的生理现象,来概括中国两千年封建官僚政治,让我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敏锐与深刻。

在他看来,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是相互依存的。用他的话来说:“大小官僚们帮助大皇帝打天下,坐天下,树立起‘真命天子’的偶像崇拜和‘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之后,他们从中分一杯羹的特权地位也就有了依据,有了庇荫,有了保障。”那些年里对“文革”批判的文章有过不少,但还很少有像他那样以一篇千字文来对历史现象做出精粹概括的。

我认识了他,并且知道了他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弟子。他告诉我,1945年,他在厦门大学听王亚南讲授政治经济学,从此,在恩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经济学,后又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王亚南的学术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当年就是由他用毛笔从头到尾誊清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经历,才酿就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随笔。

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散文与人》(邵燕祥、林贤治编)第一辑上,我兴奋地读到了

孙越生的《历史的肖像——读曹吉冈的〈长城组画〉》，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没想到，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的他，对美术也是行家里手。这是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散文。没有刻意作文，更没有在体裁上做过多选择，他只是随思想的流动而潇洒挥笔，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长城的认识，酣畅地表述出来。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学者，他的这篇谈论绘画的随笔，却具有凝重的历史感与史识，成为他理解和描述《长城组画》的厚实背景。只有在体味到他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认识和对长城的理解之后，我们才会从那些对“组画”所做的生动细致而形象的描述中，感到一种深沉的美，看到了理性与印象在文字上完美的结合。这正是他的随笔最引人注目最值得评说的地方，他以自己杰出的才能，为随笔创作增加了一种难得的凝重和酣畅。

他想走进长城的灵魂深处，而在他看来，长城魂实际上就是中华魂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他的笔下，长城的悲壮就是中华民族悲壮历史的象征：“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一统官僚政治造成的这种伟大的苦难和苦难的伟大，就像钢爪攫物、恶梦缠人一样，紧紧抓住、牢牢束缚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历史 and 亿万人民。这就是悲壮的中华精魂之所在。”文章的最为酣畅之处，莫过于他对中华魂与长城魂的渲染，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描述：

中华魂就是善与恶的共生；

中华魂就是祸与福的互倚；

中华魂就是最悲壮的美与最卑鄙的丑的相互渗透；

中华魂就是最大的忍耐和最暴烈的造反的不断交替；

中华魂就是人性的激昂高扬同兽性的执著狂热不断地发生冲突；

中华魂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自由和亿

万人最大的不自由的结合；

中华魂就是最高度的统一和最大的分散的奇妙的合生；

中华魂就是以几亿人的规模、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距离在搬演形影不离的最伟大的成就与最伟大的破坏，最伟大的压榨与最伟大的奉献，最伟大的智慧和最伟大的愚蠢！

明白了中华魂的精义，就不难理解长城魂的所在。

由一块块分散的城砖砌成为一个伟大整体的万里长城，就是建立在最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这个大一统专制官僚政治的活生生的写照，齐整整的同构。

长城是人类文化的丰碑，也是人类野蛮的记录。

长城是帝王家天下的不朽涉及，也是平民百姓为之牺牲的伟大坟场。

在长城身上，帝王个人的野心和千万苦役者的耐心都创造了世界无双的记录。

当他写出这些满腹忧愤的感叹时，他就不再是一个冷静的书斋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诗人。读过不少学者的文章，但还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着诗人的气质。

### 3

他真的是一个诗人。虽然他从未有意当诗人，也没有人把他看作诗人，但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里，在思想被扼杀人性被阉割的日子里，他却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诗。

知道这一情况是在读了他的杂文之后。当时我找到孙越生，建议他编选一本随笔集，收在我当时正在为华侨出版社主编的“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中。为取书稿，我到他家去，这是认识他好久之后第一次去登门拜访。交谈中，才知道他当初曾习练绘画，后才由美术而转为经济学、政治学的。一间小书房里，

悬挂着几幅水彩画,画面是乡间景色。他告诉我,这些是当年在五七干校时画的,更令我吃惊的是,他送我的一摞书中,都是与美术有关的,如《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巴比松派风景画》《俄国画家列宾》等,都是他翻译的。他把编选好的书稿交给我,这便是1995年出版的《历史的踌躇》一书。

他为这本《历史的踌躇》准备的代序是一首诗,这下子我才知道,他不仅画画,而且还写诗。这首诗是1972年2月为那幅水彩画《雪后初晴》而写的。画面上一排小树倔强地挺立在开始消融的雪地中。诗中有这样两段:

落日在残霞里回顾,  
这是别离的踌躇;  
初晴在阴霾中显露,  
这是希望的踌躇。

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泣,  
这是科学的踌躇;  
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  
这是民主的踌躇。

即便写诗,他还是表现出学者本色。他在那种特殊情形下用诗与画的形式来寄寓他的思想。第一次读这首诗和看他的画,我的确感到震动。我同他商量,从这首诗中取“历史的踌躇”来作为这本随笔集的书名。他欣然同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名。不仅仅映照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绪,更是他的思想与生活的一种历史的联系。

去取书稿那天我和孙越生谈得很多。他说,他重新拿起画笔是在五七干校期间。特殊环境中,学术的研究已无可能,他有一种思想的痛苦。而大自然的美丽,才让他感到真正的安慰。不仅仅画画,他还第一次写起了诗。说着,他从房间里拿出几个笔记本给我看,上面有当年的日记,有零散写下的诗句。它们中的一部分,他后来整理出来,这便是收录在后来

出版的《干校心踪》(诗配画)中的那些诗作。

他在五七干校期间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从来没有让沉重的现实把自己的精神压垮。尽管他不得不和所有人一样劳动,生活的空间是那么窄小,可是他的精神却时常拥有一个无比自由的空间。他可以独自一人思考,他可以在散步田野时让思想的翅膀自由飞翔。何况,他有一支画笔,伴随画笔的还有政治诗人的思想与灵感。

我把他称作“政治诗人”,是因为他的这些写于五七干校期间的诗,几乎每首都贯穿着他的政治思考。和那些当年歌颂五七干校的诗人完全不同,孙越生从来没有在诗中陶醉于所谓的田园风光之中。即便描写风景的那些作品,其实也体现着他的批判精神。他从那些美丽的风景背后,看到了当年农村的贫困,他从芸芸众生的生活万象中,思考着分配、权力制衡、民主等政治研究的课题。他的画和诗,记录着一个学者思想与艺术的美。阅读着它们,不能不让人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身影,徘徊在历史的远景中。

#### 4

读孙越生的诗和画,总是让人感到他与所倾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颇有些相似与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他在干校期间,能够沉静下来,不让精神陷入茫然,并拿起笔创作诗歌,与他对俄罗斯文化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入了解和体味有着直接关系。

孙越生早年喜爱美术,后来虽然改学经济和政治学,但对美术的兴趣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他学习英语、俄语,长期参与外文刊物和外国学术资料的翻译、编辑工作,业余爱好之一就是不断翻译美术方面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俄罗斯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去世前,他先后翻译出版了《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巴比松派风景画》《俄国画家列宾》《列宾回忆录》等著作。列维坦、列宾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特征,无

疑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列维坦

列维坦是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风景画家,他的风景画被认为不仅具有娴熟的技巧,能够在最平凡的景色中揭示出无限的美,而且,他的不少风景画,以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而著称。尤为著名的是他的那幅描绘流放者通往西伯利亚的道路的杰作《弗拉基米尔卡》

研究列维坦的专家说过,在俄罗斯民歌中,在普希金到布洛克的百年来的俄国诗歌中,道路这一题材被描写得生动尽致,它和对祖国的命运的深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象征着人民的生活。列维坦在《弗拉基米尔卡》一画中,就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以道路为题材,借助于由道路而引起的关于流放和“囚徒的悲哀”的诗意联想来表现丰富的社会思想和深刻的感情。他的一位朋友回忆列维坦创作《弗拉基米尔卡》的过程。他们打猎回来,走在弗拉基米尔卡大道上,景色非常优美,道路像一条白色的长带,穿过小树林子伸向蓝色的远方。在道路的远处可以看到两个女朝圣者的身影,一根倾斜的墓顶十字架带着被风雨侵蚀的圣像,说明这是古老时代的遗迹。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温柔、惬意。但是,就在此时,列维坦说:“请停一停,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卡,从前,沿着这条道路,有多少不幸的人,在叮当的镣铐声里,走向西伯利亚。”他当场朗诵阿·托尔斯泰《带足枷的囚犯》中的诗句:

草原上夕阳西沉,  
远处的羽茅草金光如焚,囚徒的脚镣,  
扬起道路的灰尘……

列维坦很快完成了这幅《弗拉基米尔卡》的创作。画面上,阴云沉沉,凄凉而晦暗,画面中央,一条坑洼不平的道路,伸向遥远的天际,伸向阴云覆盖的尽处。当时,它就被视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风景画。在沙皇专制实

行恐怖统治的年代,列维坦用描绘哀悼流放道路的作品,来向专制挑战。

孙越生一直对列维坦的人与画非常喜爱。早在1957年,他就翻译了关于列维坦的回忆录和传记交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后来的日子里,列维坦和列宾这样一些俄罗斯优秀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文革”时期,与那些备受折磨遭受囹圄之灾的人相比,相对来说孙越生受到的冲击和迫害要小得多、轻得多。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曾经师从王亚南研究封建官僚政治的学者,对五七干校这种惩罚知识分子、贬斥知识的方式,他在精神上感到难以接受。他熟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流放”。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他在列维坦这样的俄罗斯画家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那些一代又一代被流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伟大形象,在他的心中闪现。1983年《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经他修订和补充后重新出版时,他在“译后记”中便这样写到在干校时列维坦带给他的影响:

记得在那实行“知识流放”的痛苦年代里,我曾独个儿拉着板车走在夕阳西下、径路茫茫的田野上,那时我是多么感谢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卡》这幅画给我带来的慰藉。我真奇怪,列维坦作为一个想像的旁观者,竟能如此深刻地体验当事者的心灵与情绪。我的现实中的痛苦,被移情后的诗意缓解了,我的眼前的动荡不安,被永恒自然中的宁静催眠了,使我顿悟到只有自己内心的信念,即随着自己而被流放的知识,才是驱使自己永远移动双脚奔向未来的根本动力。

孙越生便是这样拿起画笔,画干校周围的风光,同时为每幅画配诗,开始了一个“知识流放者”的精神自救。

## 5

孙越生在干校期间创作的诗,目前所见共三十一首,均收录于《干校心踪》(诗画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在诗中他思考得最多的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在多处用几乎相似的句式、语言来写出自己的忧思、困惑与质疑。除了前面引过的那首《雪后初晴》中的诗句外,他在另外几首诗中也这样写道:

我被发配到  
知识的流放地五七干校  
无知在知识的宝座上狂舞  
知识在无知的淫威下哀号  
——《夏寨之秋》

无权的知识  
和贫困的农村相结合,  
有多少建设性成果?  
让受教育者看到  
教育者无知的苦,  
却不能消灭这种苦……  
——《潘庄早春》

我觉得,下面写于1972年4月的这首《晚霞,心灵留恋的苍茫》,最为集中地反映出了孙越生的政治诗的特点

天边的晚霞,  
散发出余烬的光芒;  
我拉着板车,  
孤独地走在田径上。

卑微的身躯,  
在瑰丽的自然中神伤;  
无权的知识,  
在无知的权力下彷徨。

为什么今天又要用渺小,  
去渲染伟大的荣光?  
还要用愚昧,  
来塑造圣殿的辉煌?

生命多么短促,  
生活多么乖张;  
在那长眠的墓地,<sup>①</sup>  
黑梦也不能悠长!

晚风阵阵吹来,  
余霞渐渐烧光;  
只有求知的心灵,  
留恋自然的苍茫

风景与心境、思考交融一起,感性与理性相辅相成,产生出诗的力度。一句“只有求知的心灵,留恋自然的苍茫”,把作者那种不甘沉沦、与命运抗争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表现得富有意境,漫溢出醇厚诗味。

读这些写于五七干校的诗,我感受着一个学者的思想分量。在我眼里,孙越生可敬可爱。他身处极为艰难的处境,却在艺术世界里找到了寄寓心灵的地方。他没有让思想沉寂在当时情形下,他是思想的孤独者,但并不寂寞。他有自己精神自由的天空。“我并非画家,亦非诗人。但因孤独的痛苦而感到亲近自然的乐趣,使我产生强烈的愿望,要拿起未经科班训练的画笔和用初次尝试的诗句来记录心灵和自然的对话。这是一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干校心踪》序)

说得多好。

① 在林彪下达“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分子’统统挖出来”的动员令后,有位学员不堪逼供信的冤屈和凌辱而自尽。此处所指墓地,即是其葬身之所。但入土当晚即被人掘开,剥光衣服和塑料布,暴尸荒野。后由学员再次掩埋。途经此坟,每有同悲。故作。

## 6

1997年8月,一天孙越生打来电话,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是他的一本《干校心踪》(诗画配)出版了,要送我。我说去取,可他却执意要送来。第二天一大早,年逾古稀、重病缠身的他,真的拿着一捆书来了。天气很热,他大汗淋漓。他一下子送给我十本,说他很乐意让我转送给可能感兴趣的人。那天他看上去很疲倦,但也很兴奋。书只印了六百册,而且是他自费的。他把书交给我,就匆匆走了。谁想到,三个月后,他就因病重与世长辞。他实在还有不少课题要做,他在1989年完成的《官僚主义的起源与元模式》,也一直未能出版,每想到此,便令人悲痛而遗憾。

但他毕竟留下了书稿,留下了这批干校的诗。前些日子,我仔细阅读了《官僚主义的起源与元模式》的手稿。在这部完成于1989年的专著中,他仍然充溢着激情,继续着在五七干校时期开始的思考。当然,更为系统,更有理论性。他的侧重点在当代社会,他的思考背景是“文革”,但是,他的眼睛注视着未来。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失望,不会冷却激情。读这样一本政治学专著,我却仍然感到了他滚烫的心。

我在那篇《旧梦重温时》中还曾经说过,在干校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根据周围发生的一切,来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和无奈。于是,干校的种种,对于他们就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催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许多干校中人,才有可能从一片懵懂中走出来,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思索“文革”,思索历

史,从而为后来的彻底否定“文革”做了最好的历史铺垫。不同领域的人,正是在干校时期开始了他们对“文革”、对历史的反思。个人崇拜逐渐淡去,务实精神重新得到重视,这样的反思,为哲学、经济学、政治等方面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们难以想像,没有这样一批人的影响和积极参与,“文革”后的中国,会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表现得如此活跃,如此充满勃勃生机。

我在写这样一些话时,脑海里闪现出的一些身影中有孙越生鲜明的影子。如今,重新读他的诗,读他的手稿,他的身影更加清晰。

在《干校心踪》的扉页上,孙越生写了这样一句题辞:“献给在文革中受我连累而共担痛苦的家人”。其实,当他用笔写下他所有的思考的时候——无论诗还是文章,他便把一个正直、热诚的知识分子的全部热情、人格思想献给了今天和明天的人们。

人们会渐渐认识他的价值。因他所写的一切,人们将不会忘记他。

我希望如此。也相信会如此。

定稿于1999年11月26日,北京

**【作者简介】**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记者。主要著作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风雨中的雕像》《沧桑看云》《世纪之门——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与应红合作)等。

(责任编辑 林建法)